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研究生教育四十周年。1984年初“中心”成立,12月我国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由电影所转入“中心”完成学位论文答辩。1985年,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收电影历史及理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自1994年独立招生,开始进一步开拓和发展研究生电影教育创新之路。本期刊登郦苏元、仲呈祥、陈犀禾、单万里四位学者回忆文章,将陆续刊登钟大丰、胡克、饶曙光、李迅等学者的文章,以兹纪念。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教学忆旧

■ 文/郦苏元



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由左至右:前排江岁寒、贾霖、程季华、陈荒煤、沈嵩生、徐庄;后排杨正铎、李少白、邢祖文、奚姗姗、余倩、郦苏元、王亮衡)(1984年12月)



1997届研究生论文答辩会(1997年)(由左至右:谭春发、王安奎、陈少舟、郦苏元、胡菊彬)



《电影学研究》(1997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走过了整整四十年,前近二十年艰辛创建,后二十多年稳步发展。

1984年电影中心成立后不久,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加强研究力量,建设电影理论队伍,于10月设立了研究生部(王亮衡任副主任,后为主任),开始进行研究生教育筹备工作。

当时面临最大问题是缺乏师资,没有评定职称,四个研究室不具备担任导师资格。为解决这一问题,王亮衡根据之前在电影所筹建博士点时外聘导师的做法,建议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招生,以求横向组合优势互补,得到陈荒煤同意。经过磋商,双方一拍即合,遂成立领导小组,陈荒煤任主任、沈嵩生任副主任,电影学院派人协助研究生部工作。

向国家教委申请增加招生名额获准后,12月初招收研究生20多名,攻读电影历史与理论专业硕士学位,设中国电影史、电影艺术理论、电影剧作理论和电影美学四个研究方向。导师由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电影学院老师共同担任,他们分别是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钟惦棐、程季华、罗艺军和沈嵩生、汪流、余倩。

同月中心研究生部为电影所首届电影硕士研究生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参加的有导师、中心领导、任课老师和参与电影所研究生工作人员。学生全部通过答辩,其中有三名学生毕业后进入研究室。

1986年3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最早研究生电影教育单位,也由此成为我国唯一集科研、档案和教学三位一体的电影学术机构。

然而好事多磨,一场莫名其妙突兀其来。1987年5月2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会议决定:撤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生部划归北京电影学院,四个研究室由电影资料馆领导。

犹如一晴天霹雳,顿时在研究室和研究生部炸开了锅,不说原因没有理由,一纸公文三言两语改变了二十多个人命运。大家不甘坐以待毙,自发聚集起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出主意想办法。最后一次一致同意,直接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信申辩,说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的现实意义,反映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请求收回成命,反复修改斟酌后,信件按正常渠道投放到信访站,然后是忐忑不安地等待。

天公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9月8日广电部电影局电话通知:研究生部维持现状,不划归北京电影学院。12月15日又宣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建制仍然保留,不予以撤销。事发突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死而复生的真实内幕,至今不明其详。

研究生教学得以继续,1988年6月中国电影艺

我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

■ 文/仲呈祥

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二十多名专家委员里,大概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带过硕士生、博士生,并与博士后合作过的具有“全能”教学生涯的,仅我一人。而我受命带硕士生,便始于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任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室主任的日子。

记得那是1989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徐庄秘书长通知我,说研究生部决定要我招收一名电影批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很惶恐,也很兴奋。惶恐的是,我有何德何才,配带硕士?自己虽自新时期以来,有幸赴京从师于著名的电影美学家、批评家钟惦棐先生,受益匪浅,但仅学点皮毛,两年前先生已驾鹤西去,学术靠山不在,何处求教?兴奋的是,组织信任,又给了我与攻读硕士的后生互学共进的机会。

那届是与北京电影学院共同招生。报考我的考生中有位来自浙江师范学院的陈育新,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都颇优秀,人也长得英俊中透露出灵气,我很中意。但一查学历,发现他只是高中毕业,并未念过大,是以同等学历报考的。收与不收,我请示当时负责招生工作的研究生部主任王亮衡,他不太赞成录取,而我却坚持要破格录取。这大约与我当年报考硕士研究生时也并无大学学历的类似经历发生了情感共鸣。且喜,徐庄秘书长和奚姗姗副秘书长都支持了我的意见。于是,陈育新成了我的第一位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后来的多年实践证明,我与他确实亦师亦友,互教互学,教学相长,不仅共同撰写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大学影视》,而且还结下了绵绵久长的深厚的师生情谊。他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分配到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工作。不久,他的理论批评的学术兴趣逐渐为创作剧本的才华横溢所取代。他建议从全国学术界邀请一流学者来开课。他首先想到了他的挚友王元化先生。其时,王元化先生已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专心治学。于是,先是由在研究生部工作的饶曙光专程赴沪联系,待到王元化先生抵京后,开了系列讲座都由我具体陪同。这无疑给了我一次零距离向王元化先生求教的极好

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专职编剧,并一发而不可收地以《凤凰琴》《红蜘蛛》《笑傲江湖》《征服》《燃烧》《国家行动》《黎明前的暗战》《湄公河大案》《扫毒风暴》等享誉屏坛。

1994年,我又招收了第二位攻读硕士的研究生陈伟,她的研究方向是电视剧历史与理论。学成后,她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国家广播电视台)工作,从普通工作人员一直做到副司局级干部。其间还为江苏常州写出了一部夺得“飞天奖”的反映当地革命历史文化的长篇电视剧《果子巷》,听说还被授予了“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

再到1998年,我招收了一名来自三联书店的《三联生活周刊》的编辑于彦琳攻读电视剧历史与理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她个性鲜明,自主意识强,相当男性化,据说曾剃过光头。我亦顺其自然,很尊重她的选择和爱好。毕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了。之后,自1999年起,我便受命在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攻读艺术学的博士生了。

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供职期间,为研究生培养做过的另一桩最有意义和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专职陪同从上海请来的王元化先生为研究生开“中华文化史”专题讲座。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钟惦棐先生提出对首届研究生,要补补于电影专业之外的更基础更重要的哲学、文化学课。他建议从全国学术界邀请一流学者来开课。他首先想到了他的挚友王元化先生。其时,王元化先生已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专心治学。于是,先是由在研究生部工作的饶曙光专程赴沪联系,待到王元化先生抵京后,开了系列讲座都由我具体陪同。这无疑给了我一次零距离向王元化先生求教的极好



机会。王先生儒雅睿智,平易近人,虽一生坎坷,但学者风范让吾辈望而敬畏。记得,他从儒释道讲起,一直到苏东坡、柳宗元、陆游、张载、王阳明、梁启超……纵横捭阖,博古通今,一路讲来,令大家眼界大开,哲思激荡。我至今记得,他当时讲到墨家,评价就深刻独到尤其是对其的逻辑思维和科技贡献,评析之精准,恐无人可及。我很有心地奉承先生之命把他的讲座用TDK磁带录了整整八盘。只可惜,钟先生于1987年病逝,几经搬迁,近半个世纪过去,那极珍贵的文献资料,于今恐难以寻觅或即已觅得亦年久脱磁而无法用了!

反思一生,所以我痛彻心扉道:引我入文艺门庭者,陈荒煤师也;教我文学评论者,朱塞佩也;悟我美学之道者,钟惦棐师也;启我哲思者,王元化师也!师恩难忘,永铭心怀。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研

■ 文/陈犀禾

转眼,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电影学研究生的生活已经过去四十年有余了。

我是1982年2月寒假以后进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简称“文研院”),即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在那之前,我在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考入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前夕,在报上看到文研院的招生广告,其中也有电影系,招生名额三个,导师是著名电影史学家、《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李少白,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因为我在考入大学前在宜宾造纸厂当工人时,就一直对电影艺术感兴趣,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关于“文革”中一对年轻人命运的故事,投到“峨影厂”。“峨影厂”编辑曾经找我谈过修改意见,改了几次,后来不了了之。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专业是中国语言和文学,业余也写一些小说在学生刊物上发表,对艺术创作兴趣不减。1978年看到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各专业招生的消息,曾感到十分羡慕和遗憾,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电影梦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没想到圆我电影梦的机会在我大学毕业时再次出现。后来我才知道,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的这一次招生也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中第一次招收电影学的研究生。初试的笔试是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参加的,我当时的状态极好,卷子写得满满的。记得初试有一道题,是在当时流行的十部电影中选一部进行评论。我选的是日本电影《人证》,中心观点是阐述影片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如何最终泯灭了人性。这些道理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看惯了样板戏和高大全模式的电影,再看日本电影,不免有种震撼的感觉。下笔的时候文思泉涌、气势如虹,自我感觉极好。复试则是到北京去面试。那时已是1981年的秋冬之交,一个同学还借给了我一件绿色的军大衣。

复试是在恭王府深处所谓“九十九间半”中间电影所的一个办公室进行。办公室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和我想象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相去甚远。屋子里一圈人靠墙围坐着,我被安排坐在靠门口的一个椅子上,我的对面是李少白老师,还有电影所负责和我们考生接洽的杨振铎老师,



其他老师大都不认识。复试的题目当场抽签,我抽到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理论的问题。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各种创作思潮和理论十分活跃,在大学的时候对这些发展也十分关注,于是就滔滔不绝地阐述起来。席间有一个老师(后来知道是郦苏元老师)对我的阐述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了质疑。我则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自圆其说。下来以后,心里却免有点担心自己的“顶撞”。当天晚上,杨振铎老师出乎意料地来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没有直接谈到考试的事情。但是从他的态度来看,似乎没有任何对我不利的暗示。毕业分配前夕,我得到了电影研究所的正式录取通知。当时激动和欣喜的心情难以言表,同学和老师纷纷表示祝贺。

当我1982年春节以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报到时才知道,电影研究所这次录取的学生不是三个,而是六个。后来研究生部的老师对我们解释说:由于电影所的老师对这次考生的质量比较满意,所以决定扩大招生名额,从原来的三名变为六名。他们是:钟大丰(北京师范大学77届)、张爱华(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王汉川(山东大学77届)、鲍玉珩(首都师范大学77届)、刘牛(福建师范大学77届)和我(西南师范大学77届)。导师原来只确定了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一人,后来又

聘请了著名电影评论家和剧作家贾雨。其中,钟大丰、张爱华、王汉川为电史方向研究生,导师李少白;鲍玉珩、刘牛和我为电影理论方向,导师贾雨。另外,两个方向还各设一个负责专业辅导的班主任,电史方向的班主任是王亮衡,电影理论方向是郦苏元,杨振铎是我们的辅导员,我是电影系学生的班长。

由于电影所是当时国内第一次招研究生,北京电影学术圈内对电影研究所首开国内招收电影研究生的先例颇有议论,主要是李少白老师和他的助手王亮衡、郦苏元、杨振铎等费了很多心思来设计课程,制订教学计划,聘请讲课老师,联系影片观摩,安排各种教学活动。李老师对我们学生要求严格,几近苛刻,很少表扬学生,同时对自己的教学工作也极其认真。他给我们主讲了“中国电影史”这一核心课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种种细节,对李老师当时面临的各种压力及其一番苦心,有更深体会。如李老师当时的神情以严肃居多,观点表述也力求严谨,并不似后来的放松、超脱,并常面露笑意。好在当时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整个教学体系比较完备和成熟,戏曲、音乐、美术等系已办学多年,且大师云集,如戏曲所的张庚、郭汉城,美术所的王朝闻等,给电影所增加了不少助力。(下转第8版)